

# 史德的演进及其对中国历史编纂的影响

舒习龙 陈舒玉

(韩山师范学院 历史系 广东 潮州 521041)

[摘要]中国古代史家的“史德”观由最初的“素心”、“公心”与“直笔”、“求真”等,到章学诚“强调慎辨主观与客观,尊重客观,不以主观强加于客观”以及“史德在于心术,心术在于明天人,明天人在于原道,道又折衷于孔子”,完成了中国古代史德观念的建构。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史德”观不仅受到传统史学的影响,还深受西方历史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来重新界定和诠释“史德”的新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当数梁启超、刘澹葵、柳诒徵、李泽刚等。历史编纂学追求的历史真实和历史的善性,都有赖于史学家“史德”、“素心”的涵泳,而历史编纂的语言和技巧表面上看反映的是史学家的“史才”,但实质上观照的是史学家的“史德”,可以说史家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史书编纂之优劣,也更深层次的影响到对历史编纂的理解和全局掌控。

[关键词]史德;古代史家;近代史家;历史编纂

[基金项目]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历史编纂的演变路径、主要成就与当代价值》(10YJA770043);2014年度韩山师范学院教授启动项目《私人文献所涉之近代官修史书纂修研究》(QD20140324)

[作者简介]舒习龙(1968—),男,安徽省巢湖市人,韩山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

陈舒玉(1994—),女,安徽省巢湖市人,就读于韩山师范学院政法系。

[中图分类号]K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5)02-0058-06 [收稿日期]2014-05-12

史德既属于史家修养范畴,又对历史编纂学产生重要影响,故也可视为历史编纂学着力探讨的理论范畴。历史编纂学追求的历史真实和历史善性,都有赖于史学家“史德”、“素心”的涵泳,而历史编纂的语言和技巧表面上看反映的是史家的“史才”,但实质上观照的是史家的“史德”,究其原因在于如果“著书者之心术”不正,没有史德,不辨主观客观,便不能如实反映客观历史的本来面貌,难免成为“秽史”。真正的史家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史德能催生出学术的永恒,学术永恒的追求也可以规范、造就纯正的史德<sup>[1]</sup>。史家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史书编纂的优劣,也更深层次的影响到对历史编纂的理解和全局掌控。

## 一、古代史家对“史德”的标揭和阐释

近代以前,“史德”范畴系古代史家所着力探讨的史学问题。史德的学理内涵以及史德在史家素养、史学撰述中的位置等问题引起古代史学家的关注和讨论,并逐渐系统化、学理化和抽象化。从刘勰倡“素心”开始,中经刘知幾的发覆,再经明代叶盛、胡应麟倡导“心术”、“公心”与“直笔”,“史德”说由前期依附于“史家

三长”逐渐独立,并由前期具象化的叙述演变成更关注“史”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诉求,其学理抽象的意味更浓。迄至清中叶,章学诚首次系统而深刻地论证“史德”,并系统阐释“史德”的内涵与修养方法、文人之“史德”与史家“史德”的差别等。应该说,章氏对古代史学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的“史德”奠定理论基础和学理内涵作出了重要贡献,即在批评地继承前人有关“史德”论述基础上作了有益的抽绎和总结,但他论证“史德”的逻辑是从儒家的思想里汲取资源,且强调史德即尊君,心术即名教,史德须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心术须以名教之标准为标准,故章氏的“史德”未能摆脱“名教”的羁绊。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梳理古代史学时提出了“素心”说。这表明,他已经注意到了史书撰著过程中的主、客观关系问题,认为作为主体的史家应该以儒家之“理”作为衡判史家品德优劣的根本标准。他说“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逆败之士,虽令德而嗤埋,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sup>[2][P172]</sup>刘勰的“素心”说主要是从著史的原则“理”、“道”和著史的态度“求真”的角度立论的,这对唐代史学家刘知幾首次系统地梳理和解读“史德”提供

了重要的分析史家素养的视角,具有较强的启迪价值。刘知幾对撰述史事的史家人格非常重视,他认为“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sup>[3] P192</sup>这显然是从儒家道统的角度展开立论的。他还在回答礼部尚书郑惟忠“文士多而史才少”的提问时进一步阐释了“史德”的重要性,“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sup>[4]</sup>他是从“史家三长”的角度自然延伸到史家“史德”的追寻,这样“史德”与“史识”之间产生隐喻式的联系,障碍了刘知幾对“史德”内涵的深层次探求。白寿彝曾指出,“史才三长论”是刘知幾史家素养论的核心,也是其提出的史家素养的最高标准。

随着宋元史学义理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快,明代史学家认为,史家素养仅仅有“三长”已经不够了,还应增加“心术”,其中有代表性的史家当推叶盛和胡应麟。明代史家接续元代揭傒斯的“心术”说。叶盛在其《水东日记》中专门有一条札记《史官以心术为本》,内云“揭文安公尝论史官不当专尚史才,必以心术为本。而杨文贞公亦云:天下万世之事,当以天下万世之心处之,苟出于私意,无论厚薄,皆当获罪神明。然则修史者,又必有揭、杨之心之才而后可。”<sup>[5] P236—237</sup>。此后,“心术”说在中晚明学者不乏响应者。明代学者意识到“史家三长”说有疏略缺漏之处,并以建设性的眼光来衡估史家素养。对“史德”问题学理化的史家应属于胡应麟,他提出,“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sup>[6] P1475</sup>。“公心”与“直笔”虽是借用传统历史编纂的思想资源,但胡氏上升到学理层面的探讨,对“史德”问题的总结是有重要价值的。

章学诚首次系统而深刻地论证“史德”,其贡献表现在正式将前此史家着力探讨的史家素养凝练为一个固定的范畴“史德”,并系统论述了“史德”的内涵,加深了人们对这个范畴的理论认识。他认为,“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一人不能兼,而咨访以为功”,同时强调“学问文章,聪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sup>[7] P355</sup>更为突出的是,他在“史才须有三长”之外提出了“史德”问题,认为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犹未足以尽其理”,“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即“著书者之心术”。何为“著书者之心术”?其“心术”接近胡应麟所说“二善”:“公心”与“直笔”。章学诚将其作为一种道德修养提出,着重于修史者的心术是否“正”与“直”,强调慎辨主观与客观,尊重客观,不以主观强加于客观,即所谓“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另一层是,章学诚看

到史家对待历史是非不能不动感情,因而特别提醒要尽量使自己的感情符合事理,以理性来约束自己的感情,使主观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不然,“违理以自用”,“汨性以自恣”,必然导致“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的后果,因此“心术不可不慎。”<sup>[7] (P219—211)</sup>。这两层意思,既有思想方法修养的问题,又有个人品德修养的问题。如果说,才、学、识是对史学人才业务修养方面的要求,那么“史德”则是对史学人才思想修养方面(包括思想方法和个人品德)的要求<sup>[8]</sup>。其论证逻辑散漫而又缜密。章学诚对文人与史家作了区分,认为“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并进而指出:“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sup>[7] P219—211</sup>最后,章氏得出结论,“心术”出于“天人”,原道之“道”不在“六经”,这样著史须有史德,史德在于心术,心术在于明天人,明天人在于原道,道又折中于孔子<sup>[9] P10</sup>。由此,章氏完成了自身“史德”论的建构。

## 二、演进与影响:近代史德观与历史编纂

随着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中西史学会通、融合的步伐不断加快,西方新学理、新思想、新方法的输入,客观上开阔了近代史家的视野,促成他们对中国传统史学思想重要问题——史家素养的重新思考和提炼。梁启超从新史学的立场出发,接受西方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观点,对“史德”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新观点。柳诒徵作为学衡派的代表人物,站在中国文化优越论的立场,接续章学诚“史德”出于“道统”说,其“史德论”的最主要特点在于强调历史的道德教育作用和劝惩之旨。他认识到了由史而德和从德而史的辩证关系,从而纠正了以往史家对德与史关系认识上的偏失。因此,探讨柳诒徵的史德论,有利于史学理论建设和史学史的探讨,以及对历史编纂学的深入研究。李泽刚、刘揆黎等都对“史德”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李泽刚还将“史德”与历史编纂学联系起来,其观点见解颇为深刻。而罗元鲲主要抄袭前人之成说,无甚创见。

梁启超“史德”论深受西方新史学思想的影响,西方客观的、科学的新史学思想为其剥离依附于传统“史德”中儒家道德主义哲学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工具。他认为,“历代史家对于心术端正一层,大部异常重视。这一点,吾人认为有相当的必要,但尚不足以尽史德的含义,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sup>[10] P155</sup>。所谓忠实,即指“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

参以自己意见”<sup>[10] P157</sup>。西方兰克客观主义史学强调“据事直书”相信“在历史研究中能够摒弃主观性,可以不带感情色彩的反映客观历史。梁氏深受此影响,相信史学家的“史德”就应该是“如实直书”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能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便成。但是,梁氏也意识到历史学的学科属性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所以他说“忠实一语,说起来似易做起来实难,因为凡人不免有他的主观,盘踞意识中甚深,不知不觉便发动起来,虽打主意力求忠实,但是心之所趋,笔之所动,很容易把信仰丧失了。完美的史德,真不容易养成。”梁氏虽承认纯粹、客观的“史德”很难获得,但治史者可以尽量去追求“鉴空衡平”,他强调,“史家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什么,照出来就是什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观意见铲除尽,把自己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sup>[10] P159</sup>。可见,梁启超的“鉴空衡平”是指史家在著述过程中,虽不能完全排除主观,但要有这种自觉的意识,以追求历史的真实。

1923年7月,刘揆藜在《史地学报》发表了《我国史法整理》一文,认为史家要想具备优良的史德甚难,并分析了四点原因:“盖史事有得失,则出入予夺,心相奋摩而气积。史事有盛衰,则往复凭吊,心生流连情深。气能违理以自用。情能汨性以自恣。自用则宕则激则骄。自恣则流则溺则偏。发为史文,则予夺分合抑扬咏叹之际,潜移默运不期而忤于大公之遭而不自知。此史德之难言一也。……夫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铢窃得中,又甚难也。以不中之鉴识,而加以不朽之名心,则片言是非,文外扬抑之际,默运潜移,亦不觚而忤于大公之道而不自知,此史德之难言二也。……略外剔内,掩恶扬善,又为春秋之义。此明知隐讳标扬有忤于大道之公,而情势不得不然。此史德之难言三也。……世途多隘,史家遂苟且阿时。此史德之难言四也。”<sup>[11]</sup>以上主要是从情气之易偏、鉴识之无定、国家之存怀、世途之多隘四个方面来分析,梳理脉络清晰,见解独到。他还进一步指出了史家成为良史的途径:“故史家欲成良史,符于史德,须尽去违天自用之气;汨性自恣之情,不中之铢窃,不朽之名心;秉公奋笔,无所阿容;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使史为古今中外通史,更须打破国家观念,置身世界大同。盖世界通史与国别史绝异。前者总宇宙,势无主宾。后者事属一邦,情有彼此。性无主宾者,不容有人我之见存。性有彼此者,仅许有人我之念在。因在相殊形情之下,史德常异其观也。”<sup>[11]</sup>此外,他特别强调行文自注对于史德的重要性,认为“足备史德之一端而大有助于史文之简洁周贍者,则为自注”<sup>[11]</sup>。并将史德与历史编纂学

联系起来考察,认为中国古代史体大概有三,即纪事本末体、编年体、纪传体,“夫三体各有所长短,故古昔史家创体,各欲革故开新以救短而补偏”<sup>[11]</sup>。故特别推崇章学诚对中国古代史书编纂的创新举措,对章学诚“体圆用神”的编纂思想非常钦佩,“果能依是体成史,则可断可续,可合可离。续合古今中外,即为通史。断离古今,即为断代之史。断离中外,即为国别之史。无不衔之处,无相抵之虞。体圆用神,亦莫逾乎是矣。”<sup>[11]</sup>又说“而婉转缝合之,章实斋生百年之前,史体之识周到如此,即最善西方通史,几亦不能再出其范围,于是不能不服先生空前之卓识。”<sup>[11]</sup>他认为,章学诚在史体方面具有空前之卓识,并认为西方最善的通史也不能出章氏之范围,隐然含有对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优越性的自豪感,这与他信古派的思想立场相吻合。

柳诒徵是学衡派的重要人物,他认为,史学与道德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客观上历史、史家、道德交互为用,并指出“治史而不言德则已,言德则必究德之所由来,及其为用之普遍,而非吾欲为史家始不得不正其心术。知此,则学者之先务,不当专求执德以驭史,而惟宜治史以蓄德矣。”<sup>[12] P126</sup>也就是说,“言德不专为治史,而治史之必本于德”<sup>[12] P131</sup>。由此可见,柳诒徵论史德,力图“兼本末、包内外,合道德文章而一之”,与传统“经世之学”相配合,构建独特的新儒家史学体系。其“史德论”,一方面秉持章学诚的“端正心术”论;另一方面,着力强调历史是培养人类道德修养的源泉,治史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治史提高个人的道德素养。柳诒徵进一步申论“以前人之经验,启发后人之秉彝,惟史之功用最大,谓耸善抑恶、昭明废幽、广德明志、疏秽镇浮、戒惧休劝者,皆以史为工具而求成其德也。”<sup>[12] P154</sup>在他看来,德既是作为人的一般要求,更是史家必须仅有的最基本素养,而道德获得和养成的最重要的途径是治史。柳诒徵以古人为据,指出古人治史非为史学著述,其终极目的是治史以明德。史德不仅仅是道德问题,同时还是史家个人的学识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器局和胆识,著史过程中很难对史事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因此,德、才、学、识相辅相成相互为用,这种综合看待史家素养的眼光辩证而深邃。其次,推尊史书撰述中昭信核实、存信存疑的史德传统。他指出,“吾国圣哲深于史学,故以立德为一切基本”<sup>[12] P129</sup>。另一方面,柳诒徵又认为,史职虽重信,史事却不能无疑。因此,史家秉笔,又必须慎重考订,才能勒成信史。他说“如若仅挟考据怀疑之术以治史,将史实因之而愈淆,而其为害于国族也亟矣。”<sup>[12] P148</sup>柳诒徵反对学者“徒以近百年问,国力不振,遂若吾之窳敝,皆受前人遗祸,而不知表章国光”<sup>[12] P113</sup>的治学态度,认为“礼”

为中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赖此一脉之传,维系世教,元凶巨慝有所畏,正人君子有所宗。虽社会多晦盲否塞之时,而史书自有其正大光明之域。以故他族史籍,注重英雄宗教物质社会,第依时代演变,而各有其史观,不必有缅甸相承之中心思想。而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则凡英雄宗教物质社会依时代之演变者,一切皆有以御之,而归之于人之理性’<sup>[12] P13</sup>。并进一步指出,正统必以道统为依据,方有其合理性,传统史学“正统论”的基础是道德正义。他说“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此实吾民族持以衡史最大之义。其衡统一之时代,必以道德为断。三统五德,不必拘一姓之私。而无道者虽霸有九州,不得列之正统。虽曰五德本于五行,其取相胜或相生,本无定说。学者多病其诞妄,然以道德表治统,固不得为迷信也。”<sup>[12] P78</sup>由此可见,“吾国圣哲深于史学,故以立德为一切基本。必明于此,然后知吾国历代史家所以重视心术端正之故。若社会上下道德荡然,且无先哲垂训,昭之以特立独行,决不能产生心术端正之史家,盖环境与个人互相影响”<sup>[12] P129</sup>。柳氏“史德”观,贯通经术、道统与政治,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宗旨,指明了史家修德的途径与作用,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史德论”,见解深刻而富有魅力。

柳诒徵的“史德”论对他的历史编纂思想和史书编纂体例产生了深刻影响,《国史要义》标揭“礼为史例之经”即“为国以礼,为史以礼”,史与礼的关系是“史出于礼”,礼在史中居核心地位。就史例而论,柳氏主张“史官掌全国乃至累世相传之政书,故后世之人,述一代全国之政事,而尤有一中心主干为史法史例所出,即礼是也。”“史例权舆礼经”<sup>[12] P162</sup>。柳氏对“礼”在中国传统历史编纂理论中之核心地位的论证,反映出他对传统历史编纂理论价值的认知。他从儒家立场出发指出了史例是以礼为核心的实质“史之有例,亦惟吾国所特创,他国史家莫之能先。而东亚各国之为史者,多承用吾史之例,是不可不申言之也。”<sup>[12] P218</sup>柳诒徵论述史例有多种分类,“有去取焉,有等差焉,有联散焉,有序第焉,有片语之例,有全书之例,有编年与纪传相同之例,有二体独具之例”。要之,皆为表现为“礼”而设定。正是因为史例有体现“礼”的作用,所以史家“斤斤于一字一辞者,皆事理所应尔,非好为是纤琐也”。柳氏认为,纪传、编年有共同之例,“去取等差,则编年纪事之史,皆所必重”<sup>[12] P175</sup>。它们也有不同之例,纪传体之“纪书表传次第”,“即纪传体独有之例”,而编年体则以“年次”为例。纪传体之例正胜此任,较之编年体例更擅于叙事,尤为重要,纪传体之例比编年体之例更能表现“礼”。他提出,“纪传表志之积为

正史,而编年、本末诸体莫能敌之者,何也?以其持义之正”<sup>[12] P167</sup>。纪传体之例本身就是因“礼”而定的。“夫本纪世家何以分?分于礼也。《封爵》、《交聘》何以表?表以礼也;列传之述外戚、宦官、佞倖、酷吏、奸臣、叛逆、伶官、义儿,何以定名?由礼定之也;名臣、卓行、孝友、忠义,何以定名?以礼定之也”<sup>[12] P19</sup>。纪传体之例能从整体上铨配史事,体现礼义,正是柳诒徵所欣赏的,所以柳氏十分推崇纪传体例。作为史学研究主体,史家自身素质的好坏、修养程度的高低,决定着史书编纂的质量和效果,也更深层次的影响到他们对于历史编纂的理解和全局掌控。所以,近代史家特别重视“史德”对历史编纂的影响。

1930年代,李则纲因授课之需要,开始搜集相关史料编写讲义,并于193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史学通论》。他认为,良好的史德对成为一个优秀的史家十分重要,“因为史家对于本身若无相当的修养,若无基本著史的工具,无论如何是难望在史学界卓然有所树立”<sup>[13] P185</sup>。所以,史家的修养对于史书的编纂显得非常必要,史家的史识以史德为根基,故史德对史识显然是一种约束。由于有史德,史家的史识便显得收敛、平实;如无史德,文人的史识便显得放纵、怪异。……史家之识由于有史德来规范,故能上合圣心,下明君意,绝不会把历史弄成一种伤风败俗有违伦常之物<sup>[9]</sup>。史学家成为良史必备的史德在于强烈的学术史意识和诚、爱的品质。“史学家撰述之前,最要紧的,就是先明白史学的地位,现在是在什么一个状态之下”<sup>[14]</sup>。其次,接续传统的儒家思想关于“诚”、“仁”的论述,又借鉴西方近代的道德理念,提出“诚”和“爱”为史家史德的最需要涵容的部分。他主张,“关于史家应修养问题,虽然很多,我们以为诚、爱两个字,为现代史学里最需要的成分”如何诠释“诚”,史家之“诚”意义何在,李则纲结合当时的时代条件,作了初步的学理解读。他认为,“诚是求真之本,史家尤当奉为圭臬”,“盖史以存真为贵,设所陈述描绘,尽为欺罔夸诞之作,又何贵乎有史。然人类习性,总是不能率真,总是为欺罔之性所迷罩。”<sup>[13] P186</sup>他还着力分析了产生欺罔之笔的原因“现在科学精神日进,人类求真的心理,虽然日甚一日,然而真实之神,总战不过史家的欺罔之笔,这是由于袭了词章家的舞文弄墨的气习,还是由人类对于一事实,总是要带几分渲染,不能实事求是呢?”<sup>[13] P187</sup>那么,要想改变史学家欺罔之笔的状况,李则纲认为有必要守住史家之“诚”德,“现在我们要想使史学达到真实的境地,必须严格的守住诚字的训条,极力洗练浮夸罔诞之气。宁可词意拙劣,要毋失事实的真相,这样庶可替史学界打开一个新局面,产生有价值有意义的历史,以免

历史学造谣之羞”<sup>[13] P186-188</sup>。通过李则纲抽丝剥茧式的论证,我们才能体悟“诚”德对史家撰史的重要性。对于爱,李则纲则认为,“非谓古人所持史义,笔则笔,削则削,守正不阿,而我们则存妇人之仁,隐恶扬善;亦非谓如教徒设教,宣扬上帝的仁慈”<sup>[13] P188</sup>。爱“应该是以历史为根据,是以人类活动的事实为根据。我们从历史上观察人类活动,是由疏远而渐渐接近,是由隔阂而渐渐了解”<sup>[13] P188</sup>。所以说史学固然是求真的科学,但史学存在的灵魂则是在于其求善。如果说求真表现为人的历史理性的话,那么求善则表现为人的道德理性。史学在求真之外,必然要有意义的追求,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就是史学家的最高追求。对于史学来讲,求真与求善犹如其向前进步的两轮,缺一不可。如果说求真是史学家的学术责任,那么求善则是史学家的社会责任<sup>[15] P315</sup>。

正是基于“诚”、“爱”的史德观点,李则纲对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抱有温情的敬意,对传统史书体裁的价值评价公允,且较有见地,“吾国旧史有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体诸体,同一事实,在各体里记载,或详或略,或割断,或贯串,有种种不同,就是因为体裁不是一样”<sup>[13] P113</sup>。史家选择撰述体裁,必须考量史著的性质。“系记注的性质,抑系撰述的性质?系专史的性质,抑系通史的性质?系备专门研究的性质,抑系备公众阅览的性质?”<sup>[13] P113</sup>。史家可以根据不同的史著性质,选择相应的体裁。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李则纲对传统史书体裁有清醒的认识,并试图从客观历史和史著的性质看待传统史书体裁。在20世纪章节体史书主宰中国史坛时,能以一种较客观、中立的角度来看待中西史体,值得称道。

在编纂的义例上,李则纲认为,主题的拟构、史料的选择都直接关系到史书的义例,并提出,主题拟构的原则就是根据各项事实的特性,使阅者从节目之中,即能得到事实的精确观念,要求史著标目必须能够准确、平实地反映史书的内容。他说,“历史的事实非常烦杂,吾人要于这种复杂交错的史迹中,为有系统的叙述,必须先决定主题,主题决定以后,关于编纂的工作,即易着手。”<sup>[13] P113</sup>。对于史料的择取,李泽刚认为选择史料必须要契合主题,“盖史料的价值,完全以对于主题的关系是否重要”<sup>[13] P114</sup>。此种认识是在深刻洞悉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颇具参考价值。关于语言表述,李则纲认为这是历史编纂过程中最难的工作,并总结了七个原则:①须注意体裁,因为我们立言繁简与浅深,须视体裁如何;②须注意主旨,因为主旨为作者的主眼,必须时时顾及,全篇方有生气,不致仅为史实的堆积;③须注意史料的顺序,因为史料在

史文里面的地位,不必即为原来发生的次序,我们必须使史料前后配合适宜;④须斟酌史料的剪裁,因为史实的表述,不妨采用史料的原文,但这种采取,宜多宜少,须视作者的善为估量;⑤须利用附注,因为有的时候,事有歧出,又有可疑,正文既不便分述,不得不以附注弥补;⑥须注意事实发展的状态,凡一事实的叙述,要深悉变化的过程,使事实的表现,不背变化的规律;⑦要注意首尾贯串,无论事实如何纷繁,必须使所成之史籍,前后一贯,脉络相生<sup>[13] P115-116</sup>。我们认为,李泽刚关于语言表述颇具创见的即是体裁不同,语言表述的方式应该与体裁相匹配。他还注意到论题的主旨,即他在义例里面所讲的“主题”对语言表述的影响,这确实是中国历史编纂实践中重要的问题,经过李氏的标揭,使我们对历史编纂中语言表述问题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此外,他还注意到“附注”的作用,以及“事实发展的状态”、“史籍连贯性”等问题,这些也都是我们在历史编纂中语言表述的重要问题。

罗元鲲撰写的《史学概要》,1930年写定,1931年由武昌新地学社初次刊行,1935年上海开明书店再版。在该书中,罗氏对于史家“史德”作了阐释,其观点抄袭刘澹黎等同时代的史家,鲜有创新的观点。他认为,史家的天职在于记述史实,使读者明了人类过去的真实状况,因而必须讲究史德,据事直书,纯取乎客观地位,循乎大公至正之道。但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存在着情气易偏、鉴识无定、邦国存怀和世途多隘的干扰。由于这类干扰而未能客观者尚可原谅,但那些附会残书、伪造史事、抄袭成文与虚美诬恶者,就如刘知幾所说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了”<sup>[16] P58</sup>。关于编纂,罗元鲲主要就史书体例的优劣短长和史事统计表的功效加以论列,鲜有创见。罗元鲲对记述之法讲得比较细致,既有如何记述的一般方法,又有如何记人、如何记事的具体方法。其一般方法,主要借鉴梁启超之说,分为“侧重”、“类概”、“鸟瞰”、“移进”四法。关于记人,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写出人物的个性。关于记事,则须注重整理时间与空间之关系<sup>[16] P58</sup>。

### 三、结 语

中外史学家皆重视史德修养,认为史德与史学成就水乳交融,同放异彩,“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向燕南认为,“中西方史学家都在追求历史的真也在追求史学的美,史学最终是一种真、善、美的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史学家具有高尚的史德。……人类文明的枢纽,操之于学术,学术的枢纽,操之于史学。史学上充满美,充满善,那人类的文明将更加进步。”<sup>[15] P315</sup>。综观中西史学发展道路,可以发现,中西史家都很重视史

德。中国史学从刘勰倡“素心”开始,到章学诚明确标揭“史德”并将其理论化、系统化,一直到近当代史家也非常重视史德,并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赋予“史德”新的内涵。而在西方,从18世纪开始,西方近代史学家倡言“真正的史学家,必须以学者兼为思想家”<sup>[17][P22]</sup>;“学术、理解与文学技巧”是“成功重建往世的史学家所必备三个特质”<sup>[18][P159]</sup>。杜维运认为:“博学、多识、文采翩翩,欲作史学家,必须具备此种条件。博学、多识、文采翩翩以外,史学家亦须具有优美的气质。其要者,如开明、谦虚、恬澹、冷静,皆关系历史的客观与公正。”<sup>[19][219]</sup>。由此可见,中西史德观都在时代急剧波动和文化交融的影响下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古代史家的“史德”观由最初的“素心”、“公心”与“直笔”、“求真”等,到章学诚“强调慎辨主观与客观,尊重客观,不以主观强加于客观”以及“史德在于心术,心术在于明天人,明天人在于原道,道又折衷于孔子”完成了中国古代史德观念的建构。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史德”观除受到传统史学的影响,还深受西方历史文化的影 响,出现了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来重新界定和诠释“史德”的新观点。

#### [参 考 文 献]

- [1]章开沅.论史魂[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1).
- [2]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3]刘知幾.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4]刘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5]叶盛.水东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6]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金沛霖.四库全书·子部精要(中)[Z].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 [7]章学诚.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8]谢保成.传统史学与史学传统[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 [9]雷戈.“史德”新论[J].史学月刊,2006(8).
- [1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11]刘掞黎.史法通论[J].史地学报,1923(6).
- [12]柳诒徵.国史要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13]李则纲.史学通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 [14]李则纲.怎样读史论史与著史[J].学风,1934(4).
- [15]向燕南.从历史到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16]刘泽华.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 [17]G. N. Clark. Historical Scholarship and Historical Thought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18]Alan Richardson. History Sacred and Profane [M]. Westminster Press, 1964.
- [19]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Historiography – valueHistoriography – valueEvolution of Historiography – value Andthe influence to china’s Historiography Historiography – value

SHU Xi – long ,CHEN Shu – yu

( Department of History Han – shan normal College Zhao – zhou 521041 China)

**Abstract** “Historiography – valu”view of China ancient historians, “truth” etc, Comple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ancient “Historiography – valu”view, from the initial “heart”, “public” and “objectivity” to Zhang – xue cheng’s “Historiography – valu”view. Since the modern times Chinese “Historiography – valu”view not only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but also by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history and culture, e – merge new viewpoint of “Historiography – valu”to be re – define and re – interpreted,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f the views belongs toLiang – Qichao, Liu – Shanli, Liu – Yizhi, Li – Zegang etc. The pursuit of the truth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nature of historiography, are dependent on the cultivation of historian “Historiography – valu” viewand “heart”, the historian’s own quality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historiography, but also influences deeply for its understanding and global control of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 “Historiography – valu” view; Ancient historians; Modern historians; Historiography

[责任编辑、校对: 把增强]